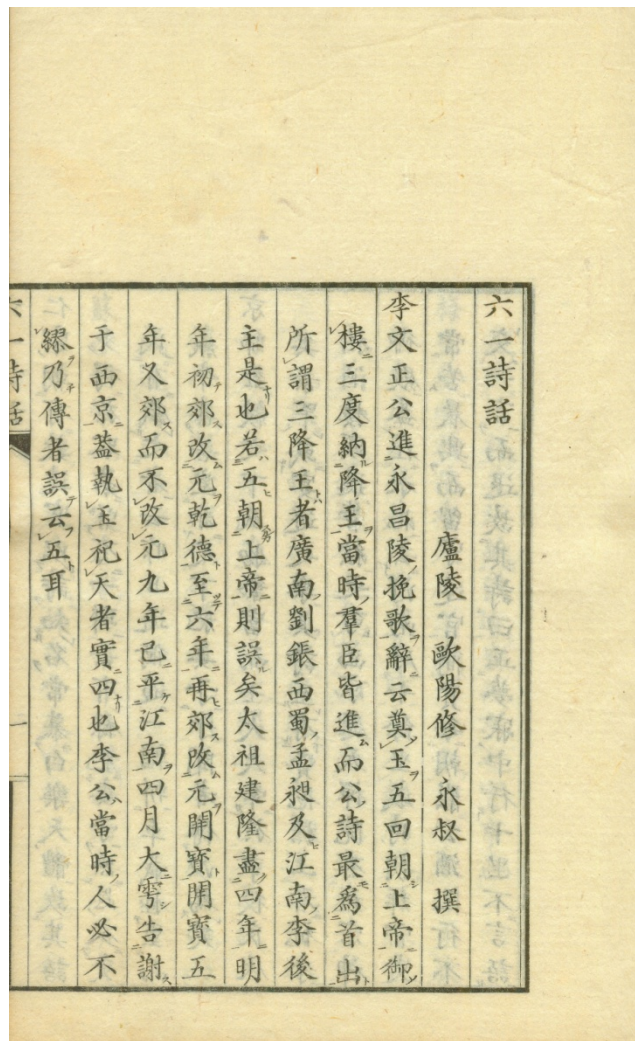


歐陽脩的文集哪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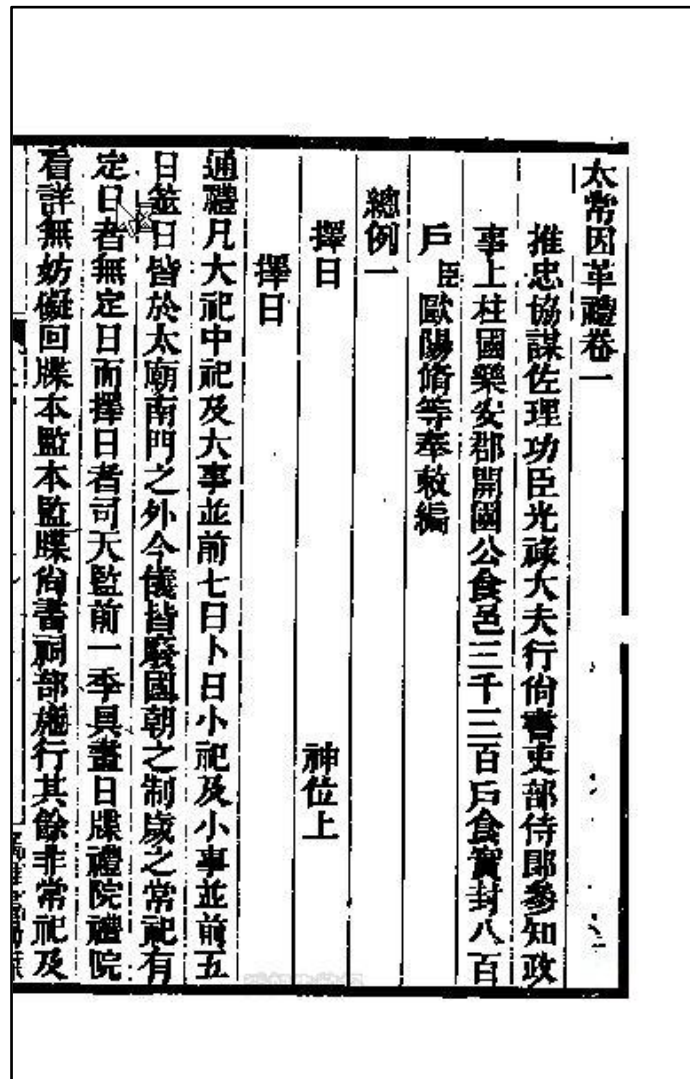
辛 德勇

前此我寫過幾篇短文，談《五代史記》的書名和作者名稱問題，鄙意以為日後若有機會重新認真點校整理出版這部書，不宜繼續沿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那個動亂的政治年代裏極其錯誤地改用的《新五代史》一名；同時，也不宜沿用晚明人將該書作者題作“歐陽修”的荒唐做法，理應恢復其本名，即題作“歐陽脩”著“五代史記”。

在明汲古閣本、北監本的崇禎“再刻本”和清武英殿本把《五代史》（《五代史記》）的作者改題作“歐陽修”以及明北監本的崇禎“再刻本”和清武英殿本也把所謂《新唐書》的作者改成“歐陽修”之後，由於讀書稍多者為習練古文，都要不同程度地利用歐陽文忠公纂修的這一《史》—《書》，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人，便循此先入為主，把“歐陽修”視作歐公固有的姓名。



文化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一年）日本京都書肆刻《六一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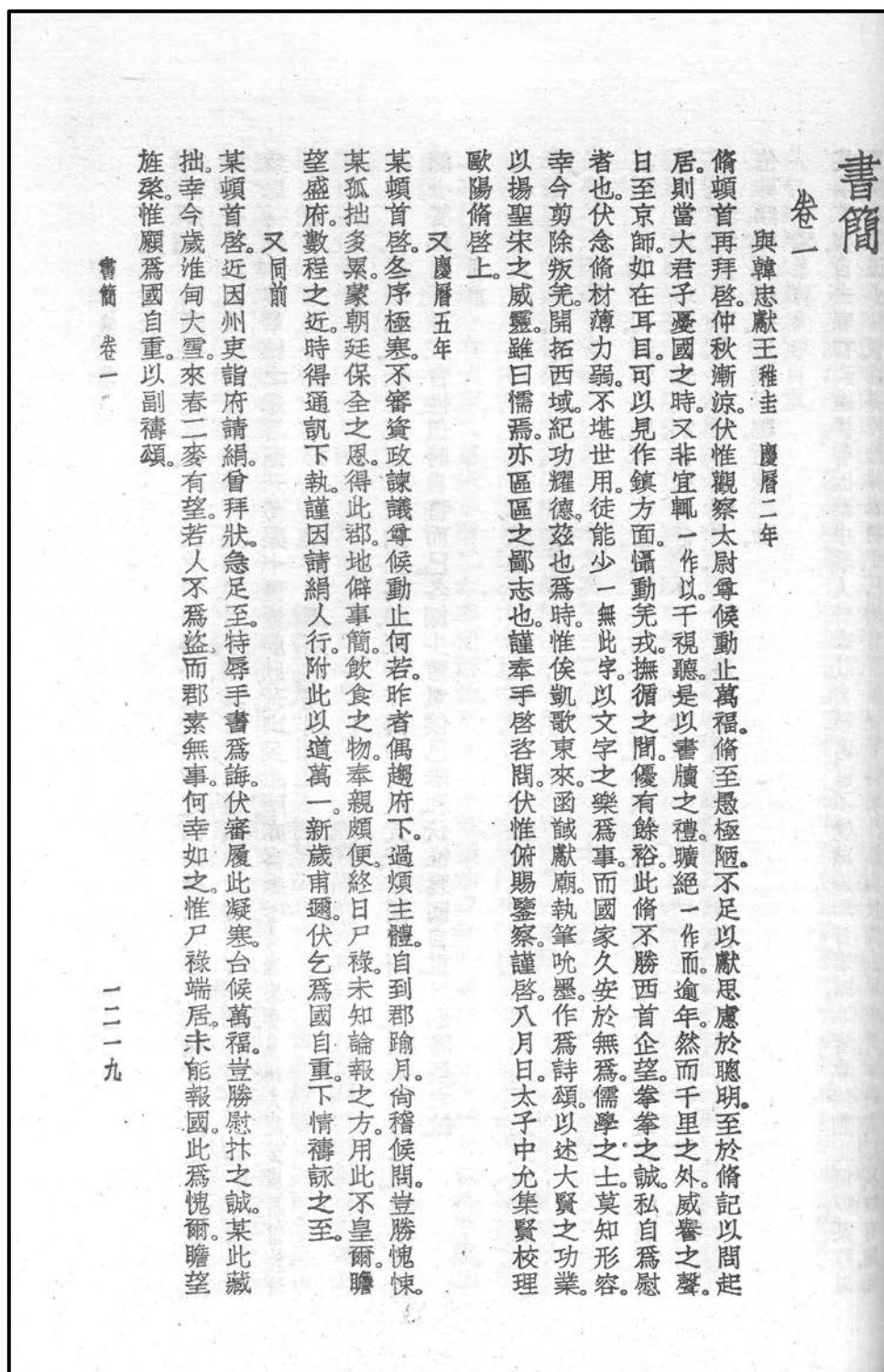


清光緒間刻《廣雅書局叢書》本《太常因革禮》

晚明以前，文忠公所有的著作，當然都是題作“歐陽脩”；甚至進入清代中期之後，一些人刊刻其書，尚依舊題寫他的本名。例如，道光年間瀛塘別墅刻本《毛詩本義》，就依然題“廬陵歐陽脩著”；又如光緒年間刊刻的《廣雅書局叢書》本《太常因革禮》，亦題作“臣歐陽脩等奉敕編”。但皇帝和朝廷的權威畢竟是強大的，殿本歐公《唐書》和所謂《五代史》（《五代史記》）對讀者的影響，廣泛而又強烈，清代刊行的很多歐公著述，還是被改題為“歐陽修著”。好在這種改動還不算十分顯眼，因為書名遠比作者的署名更加吸引讀者的目光。然而，對於歐陽脩的文集來說，情況就不大一樣了。

古人編纂個人詩文集，不管是自編自定，還是他人後世為之輯錄，在大多數情況下，其書名並不採用“姓名+集（或某集）”的形式。這是古人做事講究對人要尊重，而直呼其名，在過去的人看來，與指着人家鼻子相貶責，差相近似，是很不禮貌的。歐陽脩為人處事，都顯現出良好的品德，人們對他普遍敬重有加，更不能以這樣粗魯的方式來稱呼他的著述（如《薛濤詩》、《唐女郎魚玄機詩》這樣的書名，乃與薛濤和魚玄機從事的是特種行業有關。又如《唐百家詩》中具體的每一種，題作“某某詩集”，這與通常意義上的書名，實際還有所區別。當然也還有其他一些例外）。從宋代開始編印的歐公文集，往往就都加入他的謚號，題作“文忠集”或“歐陽文忠公集”之類的名稱；或是冠以“先生”，稱作“歐陽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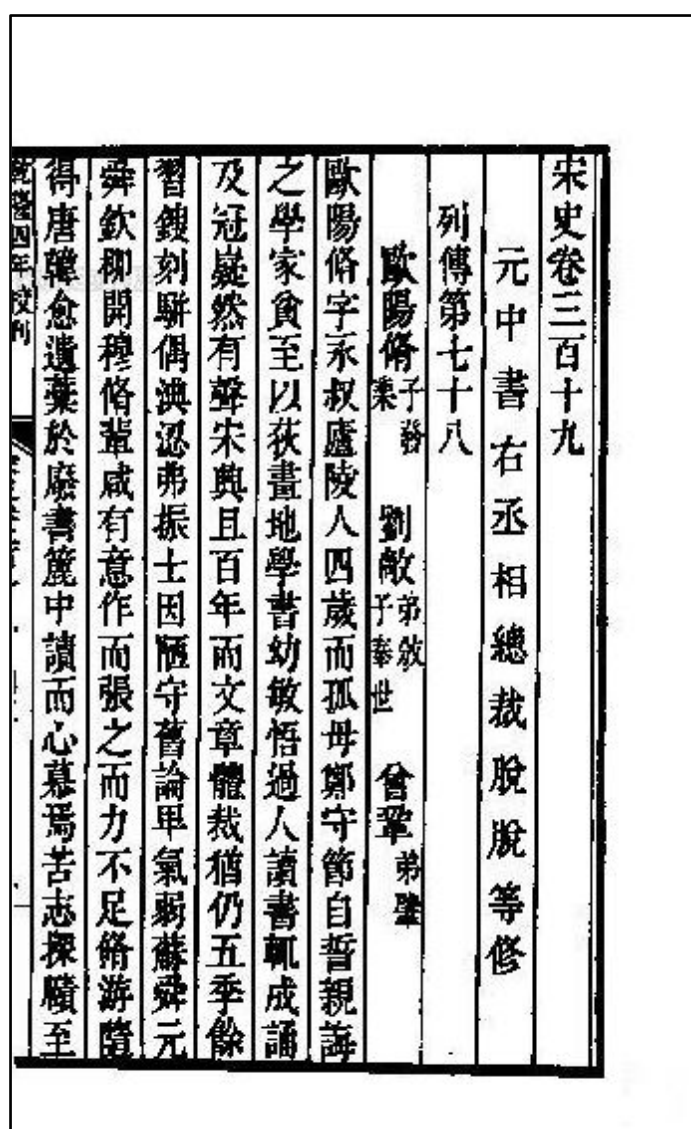
等，內文各卷的卷端，通常也不再另行鑄入作者的名字。在這種情況下，清代的翻刻本，即使在文中改“脩”為“修”，讀者中心裏明白歐陽先生實際叫什麼名的人，看了也不會太過難受，還能對付着讀。



世界書局本《歐陽修全集》內文

隨着民國的肇建，西風東漸，日益增強，世人不再拘於古禮。結果世界書局、中央書店等印行歐陽文忠公文集，就在一身“西裝”上，堂而皇之地標記“歐陽修全集”這一籤條。

好在像這類“書局”，胡亂印書，是其常態，在當時學者的眼中，本無足輕重，而且妄改書名未必也同樣妄改內容，像世界書局本的內文，凡遇歐公尊名就仍然印作“脩”字。再說真正有氣派的大出版單位，並不這樣孟浪。如中華書局，在《四部備要》中印行的歐公詩文集，就是《歐陽文忠集》。比中華書局更有學術權威的商務印書館，在其王牌產品《四部叢刊》當中，雖然編輯者受清代殿本《歐書》和《歐史》影響，視作者姓名為“歐陽修”（見《縮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錄》），但影印的是元刻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就連收錄在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大路讀本《國學基本叢書》和《萬有文庫》中的歐公文集，也是以《歐陽永叔集》作為書名。身處這樣的文化環境，對於稍微多讀幾本古書（其實清武英殿本甚至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的歐公本傳，仍沿承古本舊貌，鑄作“歐陽脩”，並未像殿本《歐書》、《歐史》那樣改刻為“修”字），或是因經見一些宋人碑刻法帖而知曉文忠公自署姓名的人來說，淺學俗儒之妄誕鄙俚，仍可忽而略之。



殿本《宋史》之《歐陽脩傳》

本朝開國，統一整頓改組各書籍出版單位。結果是組建了兩家超一流的古籍專業出版商社，即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平心而論，除了弄影印古刻舊本，再也無法企及張元濟

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所達到的高度之外，在點校整理古籍方面的成就，卓越空前。然而權威愈盛，一旦出現差誤，造成的消極影響，也就愈加嚴重。

1949年以後，連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文集，都直接以姓名入題，書作《毛澤東選集》，腐朽沒落封建文人的別集，當然沒有理由再奉以謚號或表字以示禮敬（不過，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編印獨夫民賊蔣中正的集子，倒是題作《蔣介石文錄手跡》之類，一遵古制，以字恭稱）。歐陽脩的集子，先是由商務印書館用《萬有文庫》的紙型重印了《歐陽永叔集》，雖說這還維持着前朝的舊局面，但祇是在重定新版之前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到了本世紀剛剛開頭的200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由李逸安重新點校整理的全集本，便徑行題作《歐陽修全集》。當然再也不會像世界書局本那樣克制，祇改書名，不改內文，這個《全集》本內文中“歐陽脩”的“脩”字，統統被強行“改定”為“修”了。費了很大勁兒校改古籍中的譌誤，卻毫無根據地把作者的名字給改換掉了，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無獨有偶，至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歐陽修詩文集校箋》。接踵而來的兩部文忠公詩文集，迅即成為學術精英和社會大眾兩方面人士最便捷的讀本。以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無上權威，再看看這兩部書是分別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和《中國古典文學叢書》這兩大系列之中，其通行之廣，讀者之眾，俱可想而知之（再加之《全宋詩》和《全宋文》這兩套宋人詩文總集，也都是把歐公的名字改寫成“修”字）。這樣一來，傳統的書名沒了，作者的姓名也改沒了（請注意，這兩部書都是正體豎排本，即使是要硬套所謂“簡化字”的規範原則，也是絕對套不進去的）。這樣一來，“歐陽脩”其人的集子，真的就要徹底湮沒無聞了。

不過，不幸之中也有萬幸。這就是中華書局本雖然把書名定作《歐陽修全集》，但封面上題寫的籤條，卻是“歐陽脩全集”。千萬別小看這個似乎無足輕重的書籤，雖然出版社沒有標識，但稍知當代書法者都可以看出是出自誰手。或許有人以為，這大概是啟功先生按照自己的用字習慣，隨手一寫而已，未必是有什麼不同的看法。至少我不這樣認為。元白先生是書法大家，像歐公自署的書帖和同時人寫錄的歐公自署題名，諸如文忠公自書《灼艾帖》和《瀧崗阡表》、蔡襄書《畫錦堂記》、蘇軾書《醉翁亭記》等名帖名刻，自久已爛熟於胸，歐、宋《唐書》和《五代史記》的舊本，當然也不會一無所見，再說就連《辭源》這種通行的“俗書”，標記的也還是“歐陽脩”這個本名，而自幼所受的教養，絕不會允許他去胡亂書寫永叔先生的大名。有心的讀者，捧着封面仔細揣摩，或許還能看出一絲端倪。



中華書局本《歐陽修全集》書脊上的正式書名和封面題籤

那麼，啟功先生爲什麼不向中華書局的主事人說明，本不應該把書名定爲“歐陽修全集”？內中情況，我無由得知。元白先生即使講過，也未必有人願意聽從。但我覺得更有可能是根本沒有講，他祇是按照自己掌握的知識，正確地給人家寫出字來而已。作爲大清王朝的龍子龍孫，我想，在看待今天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和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前清尊官重臣後裔，應該是有許多相通之處的。在陳寅恪先生的面前，是沒有什麼能看得下眼的，啟功先生則是看什麼都是那麼回事兒，何必當真。——同樣是混沌得不值一顧。

2015年9月5日晚記